

# 社会变迁的民族视角分析论纲

## ——兼论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

岳天明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社会变迁的实体在于社会及其结构,人们对于社会变迁的分析总落脚于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体及其文化上。对社会变迁进行民族视角的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学理上探寻社会变迁及其与民族视角分析的契合点,在探析对社会变迁进行民族视角分析的意义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分析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西北社会;民族视角;社会变迁;发展动力;特征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2)03-0087-06

随着民族间人口流动的普遍化和规模化,族体特征的完整性保持变得异常困难<sup>[1]</sup>。如今,民族问题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民族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社会中的个体与群体,对于他们而言,社会变迁可能有着不同的结果和意味<sup>[2](P.2)</sup>。就中国的整体状况而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进程较为缓慢,变迁的范围较为狭窄,变迁的内容较为单一,变迁处于较为浅显的层面<sup>[3]</sup>。笔者认为,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既具有一般社会转型的特征,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与特征<sup>[4](P.398)</sup>。

本文试图在学理上探寻社会变迁及其与民族视角分析的契合点,试析对社会变迁进行民族视角分析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西北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在笔者看来,与此相关的议题应该属于“我国民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战略性、全局性问题的前瞻性研究”<sup>[5]</sup>,对其展开分析和探究无疑是对中国民族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的积极回

应,而且也有助于民族社会学学科地位的提升。

### 一、社会变迁及其与民族视角分析的契合点

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格调和性质使社会变得越来越不确定<sup>[6](P.286)</sup>,社会变迁研究早已成为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之一。社会变迁的实质在于社会结构的变迁,所以社会变迁的实体在于社会及社会结构。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既泛指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又特指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既指社会变化的过程,又指社会变化的结果。因此,一方面可以认为,社会变迁是指向社会本身或社会结构的具有某种明确特征的改变,不管这一明确特征是一种规范还是关系<sup>[2](P.4)</sup>,都是作为整体性的事实陈述而非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与发展的概念一样,社会变迁也是一个具有比较属性的整体性概念,很难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变迁模式或惟一道路。而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编号:08JJD88024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编号:09XJA840002);西北师范大学科技创新项目;2011年度甘肃省高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

**[收稿日期]**2011-11-02

**[作者简介]**岳天明,男,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且不同民族各自的变迁、发展道路又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总体性问题,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sup>[7] (P.25)</sup>。

社会生活取决于社会环境。英国人类学家 T. K. 彭尼曼指出“如果不研究种族和文化借以发展的媒介——环境,那么对种族和文化的研究将是不完整的。”<sup>[8] (P.201)</sup>人们对于社会变迁的分析和考察总是以社会环境及社会结构为基本的切入点,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解释社会变迁的实际<sup>[9] (P.97)</sup>。于是,人们的观念、欲望、动机和意志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变迁<sup>[10] (P.350)</sup>。费孝通说得更为直接和到位。费孝通指出“真正的社会转变就是人的转变。”<sup>[11] (P.61)</sup>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铭铭指出:所谓“变迁指的是一个族群在与其他族群的接触过程中,新的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介入所造成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的改变。”<sup>[12] (P.198)</sup>美国学者奥格本指出“文化的物质器械有时可以脱离人类而存在,尚能想像,至于人类可以脱离文化而存在,便很难想像了。事实上人类与文化是同时发生的。”<sup>[13] (P.8)</sup>克利福德·格尔茨也非常相近地指出:“没有人类当然就没有文化,但是同样,更有意义的是,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sup>[14] (P.62)</sup>以色列学者耶尔·塔米尔指出“不存在什么独立于环境的人类本质。人类是在与文化的紧密互动中发展起来的,他们是‘未完成的动物,他们将通过文化——而且不是一般的文化,而是高度特殊的文化形式——来完成自己’的。”<sup>[15] (P.4)</sup>

事实上,文化是一个有序的意义之网和象征体系,社会的互动必须依据文化而发生,而社会结构是行为的形式,是实际上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自身互动的模式本身。所以,文化和社会结构不过是对于同一现象的不同抽象。在考虑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时,是从社会行为对于行为者的意义的角度来考虑文化的,而社会结构是从对于特定社会体制功能的促进的角度来加以考虑的<sup>[14] (P.177)</sup>。如此,对于社会变迁的分析就落脚于社会结构,进而落脚于对文化的分析。作为民族发展的要素,也作为民族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文化及其互动是一个普遍存在于异文化之间的动态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可以无限延续的过程<sup>[7] (P.150)</sup>。克利福德·格尔茨甚至更为直白地指出“社会的形态即是文化的实体。”<sup>[14] (P.36)</sup>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对于社会变迁进行民族视角分析的耦合点。

## 二、对社会变迁进行民族视角分析的意义

在近百年的汉语使用中,对民族的定义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仔细体悟民族作为“稳定的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的语言、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素质、民族认同等特征要素无不属于文化的范畴,并在文化的框架内得到了理解和说明,这样的思考路径也与我们几千年来的历史传统相一致,那就是“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和层面来看待民族问题”<sup>[16] (P.26)</sup>,这种理解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思路客观上已经被一些西方国家所采用。

社会变迁时时存在,每一个做过实际调查的学者都对此熟知,他们没有理由对社会变迁的存在表示怀疑。笔者认为,对社会变迁进行民族视角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视角就是文化的视角和生活的视角,对于西北民族社会来说,民族视角也是一种现实的视角。民族的视角不仅与我们的研究对象相一致,而且也与我们的认识和研究取向相统一。

笔者在相关的研究中指出,西北民族社会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双重挤压困境”<sup>[17] (P.146)</sup>。当我们把西北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和场景提出来并对其展开集中研究时,其间自然渗透着研究者本身的主观取向,即西北社会和非西北社会“自然的”乃至“非自然性”的区分,也许二者之间的“非自然性”才是问题的根本和关键点。我们认同历史上业已形成了的而且很难得以消解的“自然性”的区分,而对西北社会和非西北社会之间的“非自然性”的区分则存有难以释怀的心绪。从“自然性”出发,我们自然要强调民族的视角;从“非自然性”出发,我们也必须强调民族这一视角。因为只有这样,人们对于西北社会发展的低成本路径问题、发展的独特性问题、发展的代价及其支付等相关问题才会达成认识上的一致和统一,也只有在意民族视角的前提下,才能对已有的理论预设和定型的话语存有敏感的追问,才能在看清楚现象记录和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有望建构新的理论和解释框架。如此,才能从底层(基层)学术中发现和凝聚社会学学科研究的根本动力和民众力量。从学理的角度出发,社会变迁的民族视角的分析意义才会凸显出来。

社会变迁的事实性陈述无法也不可能将民族

社会的日常生活排除在外。既然“在复杂的社会中,人群已被多重的深层划分纵横切割,每一部分均有其亚文化”<sup>[6] (P. 303)</sup> 那么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就成为必然。人们对于文化互动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简单来说,这个过程就是从“单向倾透和兼并”到“双向采借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互动中相关民族的地位对等,实质上就是当事各民族对对方的作用与反馈不可忽视,都得通过调试去达成动态平衡”,这必然是“一种正视交互作用与反馈的地位对等关系”<sup>[7] (P. 153)</sup>。然而,理论上的分析与现实中的情况毕竟存在出入,惟其如此,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诸多学科不仅需要在意“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以其整体的视野理解世界各地的民族”,而且必须在意多民族国家内的不同民族及其日常生活。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有更好的资质和材料去解决对整个人类来说最为重要的问题。为了防止威廉·A·哈维兰所说的“我们有太多的人不足以应付在现代世界生存的许多要求”<sup>[18] (P. 30)</sup>的现实,必须进行有关社会变迁的民族视角分析,只有如此才能够更深地理解社会变迁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并存性<sup>[18] (P. 165)</sup>,以这样的视角来分析社会变迁,自然会“尊重其他民族的尊严和文化的完整性”<sup>[18] (P. 468)</sup>,避免在文化互动过程中,一切民族对外族文化的系统性的排抗状态。

马戎在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社会学的研究时指出,国内的民族研究一般来说往往针对一个民族本身而缺乏对于民族之间关系的分析,这与西方注重现实社会问题,将研究民族问题的重点放在多民族社会中的民族关系上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sup>[16] (P. 39)</sup>。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未尝不是国内相关研究和研究者回避中国现实的民族差异、民族交往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民族问题的某种表现,究其原因,大概与我们多多少少地缺乏对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社会变迁的民族视角的分析不无关系,而对于社会变迁的民族视角的分析不能不以鲜活的民族社会文化进入研究者的视阈为基本前提。这样一来,如果我们透过社会变迁的理论表述对其意义和其他宏大叙事进行阐释,那么理论的视角必然会触及和关注人们的日常行为层面,必然会驻足于特定生活方式下人们的生活、经历和思考,如此才能凸显和重视民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世界,这也是民族学研究的人道性<sup>[19]</sup>和社会学研究

的人性关怀<sup>[20] (P. 26)</sup>的体现和基本要求。

以民族的视角分析社会变迁,自然渗透着对业已分割成不同部分和不同类型的社会世界的平等的关注,为我们提供一个隐藏着的镜头,透过它才能将对于社会变迁的研究和表述置于我们研究的特定民族生活的事实水平上<sup>[21] (P. 290)</sup>。也就意味着,这样的研究并不是对于抽象的经济、抽象的文化和抽象的人的研究,而是对于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社会变迁道路的深入理解。可以说,一个成功的社会变迁的理论分析得益于它通过对话过程和生命关照所揭示理论的内涵和现实的折光,并在这两者之间往返穿梭直至游刃有余。社会变迁的民族视角的分析类似于“柔和的聚焦”<sup>[22] (P. 145)</sup>,它要求我们在深刻洞悉分析对象及其所处背景的基础上,广泛关注和设法关涉其延存的背景和前景。它强调视觉的广度,因而是一种开放性的视角;它在意现状的形成轨迹,因而具有反思和批判的意味;它既试图竭力捕捉整体,也欣然接受和认同那些被称做文化的共有的理解,因而是一种整体的有广度的视角。

社会变迁虽然是一个中性概念,但由于人们总是从保障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所以人们关注社会变迁总是意欲积极引导其进步的方向。借用英国学者弗思的观点,如果说我们的研究尚且缺乏打开发展之门的钥匙的话,我们试图能够争取找到点润滑油涂在门的合页上,这种努力通过借助于以民族的视角来分析社会变迁得到表征,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对产生困难的原因作出基本的分析。以民族的视角分析社会变迁,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实际调查研究只是限于时间过程中的一个片断”<sup>[13] (P. 443)</sup>的静态分析,使分析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也更具有现实意义。所以,对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民族视角的研究应该成为研究西北民族社会的重要任务。

### 三、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

纵观之,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特征较为明显,我们分别从社会变迁的起点、进程、动力和任务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 (一) 社会变迁起点的落后性

诚如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所指出的那样,历史的因素是非常强有力的因素<sup>[23] (P. 182)</sup>。对中国

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 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对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具有制约作用。在封建制度占据支配地位的两千多年间,中国“在制度模式上,长期保留某种可以辨认出来的相似性”<sup>[24] (P.100)</sup> 封建的经济结构处于一种“超稳定状态”<sup>[3]</sup>。在后来缓慢且漫长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落后的经济水平和不再适合新时代要求的传统观念(包括政治观念)使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发展遇到了多重阻力,面临“双重挤压困境”。

所以,不管以怎样的视角和标准来分析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历史和现状,若与同时期其他地域的社会变迁相比较,总是具有发展的落后性和低起点性。

## (二) 社会变迁进程的迟缓性

“文化互动导致的文化变迁的实质是一种界面效应作用下的民族发展。”<sup>[7] (P.160)</sup> 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起点的落后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变迁进程的迟缓性。在一般情况下,“在正常时期,农民社会的变化是很缓慢的,一种新事物在那里只有看起来不再‘新’的时候,才真正被接受了,因为那时它已经并入了既存的系统。”<sup>[25] (P.35)</sup>

只要社区缺乏改变社会结构和精神生活的动力,它的文化就会凸显出永恒不变的态势<sup>[26] (P.83)</sup>。因为,社会变迁和文化是有直接关联的,更有西方学者直接以文化变迁来取代社会变迁。文化的启蒙和经济的推动是任何社会变迁的根本力量,文化本身作为一个不断的创造过程,必须持续地吸收并转换新的相异的因素<sup>[21] (P.80)</sup>。如今,虽说“原有的

基于自然地理环境的隔离而形成的地理单元被打破,山川地貌等自然因素在族际交流和互动中的阻碍作用会越来越小”<sup>[27]</sup>,但西北民族农村地区的区位特点决定了它和其他社会单元发生信息互动的可能性较小、频率较低,这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与外界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从而造成原有社会结构中文化要素的“堕性”或变迁过程的“路径依赖”,而每一个结构要素的自组织和不断自我完善的特性势必会形成或者在此基础上力图维持一种比较稳定的结构均衡状态。

笔者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和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作调研时,通过年长的老人们了解到,这一地区农村社会的自然环境、居住格局、生活样态在几十年来基本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他们一致承认,自己基本重复着旧有的生活方式。虽然拉德克利夫-布朗告诫人们,“老年人可以询问他们亲眼所看见的变迁,固然他们的陈述必须极慎重地加以应用,而且采取严格的批评方法,以去伪存真”<sup>[28] (P.186)</sup>,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对老人们的陈述抱有怀疑的态度。可以说,从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实际看,突出地表现出无明确取向的自然进化式变迁、以温饱为基本需求焦点的低层次变迁或者有生活场景而缺乏生存质量突破的民族社会结构的再复制,从而使西北民族社会变迁呈现出与其生存环境演化的同步性特征,迟缓性甚至反复性成为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突出特征。关于这一点,下表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佐证。

东乡县坪庄乡卫生院历年基本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张

年度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3
医疗人员	4	3	2	3	3	3	2	3	3	4	4	3	3	4
护理人员					2	2	2	2	1	1	1	1	1	
合计	4	3	2	3	5	5	4	5	4	5	5	4	4	4
床位				1	1	1	1	1	1		1	1		2

资料来源:秦臻、马国忠主编《东乡族——甘肃东乡县韩则岭村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63页。

比如,东乡族农业生产的历史可上溯到明代,但至今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仍然十分落后,“仍以杠子、犁头、镢头、铁锨、木锨、木杈、榔头、连

枷、石碾和石磨为生产工具,20世纪40年代末期,东乡地区有耕地43万余亩,其中水地6700亩,仅占耕地总面积的16%,粮食总产量1150余万公

斤,平均亩产仅45公斤(粮食播种面积25万余亩),人均占有粮食只有110余公斤”<sup>[29]</sup> (PP. 27~28)。从整体来说,中国的民族发展在各地区、各群体中的表现是不均衡的,其中,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距非常突出,就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来说,更具有发展的迟缓性。

### (三) 社会变迁动力的模糊性

从理论上说,“一个社会发生变迁,出于两种力量——内在的和外在的。”<sup>[13]</sup> (P. 443) 如果社会系统成员在几乎没有外界影响的条件下能够创造和发明新的思想并在系统内部得以推广,则属于内在动力作用的结果,可以称之为内发变迁;而社会系统之外的新思想被传进进来,也可以引发社会变迁,可以称之为外引变迁。

我们不能过于笼统地谈论社会(尤其是民族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而应该对我们的着力点有所自觉<sup>[30]</sup>。一般来说,当促成社会变迁的外在力量能够融入原有的文化结构时,就会产生极大的变迁促进。“如果有可以和传统模式想融合或联合的新形势,那么它就好比没有任何联系的时候更有可能被接受。”<sup>[2]</sup> (P. 185) 对于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来说,一方面,民族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水平还很难适应民族社会变迁和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文化的保守性造成了作为社会变迁中介的人的“价值困境”,从而使民族文化结构严重缺乏现代理性因素的冲撞,对任何在实质上不同于传统的新思想、新行为和新事物缺乏主动接受的意志,造成变迁的内在动力的不足<sup>[31]</sup>;另一方面,在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促使民族心理发生变化的种种机制和外部效应被人为地割断了,所以,虽然在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的启动和运行中,外在动力显得相当重要<sup>[17]</sup>,但相对而言,其成员不愿意接受新经验,不愿意同外界进行广泛的接触,致使他们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反过来又强化了旧有的模式。如果一个社区的居民最容易接受的是那些和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念相似的促进因素<sup>[18]</sup> (P. 452),那么西北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对于包括组织和制度力量、政策和法规力量以及城市和市场力量等在内的外部发展动力的反应则相对不敏感,从而造成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动力的模糊性。

### (四) 社会变迁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社会变迁的以上特征决定了西北民族地区农

村社会发展的任务异常艰巨和复杂。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结构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其“板块式”的组合,社会各单元、各部分之间缺乏内在的同一性,联系极为松散,社会的整合程度很低<sup>[31]</sup> (P. 99)。因此,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比东部和汉族地区更为复杂,面对日益“恒常而密集的流动形式”<sup>[32]</sup> (P. 90),民族地区日益表现出对远距关系(distanciated relations)的地域性情境<sup>[32]</sup> (P. 95),各民族要求发展的愿望被不断激活,而变迁和发展问题却只能一步一步地得到实实在在的解决,即便拥有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西北民族地区有计划的社会变迁的顺利推进也是长期的历史任务,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省的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直线的,而是有反复的。在传统社会,行政势力和宗教势力在社区层次上是并存的,而在最基层主要由家族势力支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行政权力占据了绝对的地位,直至在一个阶段消除了宗教势力,解散了家族组织。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组织不再包揽一切地方事务,宗教势力开始恢复,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家族组织和邻里组织也重新发挥部分功能。”<sup>[33]</sup>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 (五) 社会变迁方向的可引导性

如果接受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就会把现代化理解成一个历史的过程,“非西方不发达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惟一途径,就是西方化或照搬西方模式”<sup>[34]</sup> (P. 71)。顺此,自然得出民族地区现代化的“模仿性”特征<sup>[35]</sup> (P. 154),但如果换一种角度来分析,则会认为民族社会具有发展方向上的可引导性。依据塞维斯的“进化潜势法则”,一个将其所拥有的一切潜力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的民族,它的可塑性必然是处于极低的状态,它在社会变迁道路上的潜力会越来越小<sup>[35]</sup> (PP. 139~140)。笔者认为,由于种种原因,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的潜力仍有待挖掘。

当今世界上的民族,不管多么不发达,都与其他文化有着某种积极的联系<sup>[13]</sup> (P. 450)。在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中,频繁而密集的文化交流在不同时代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sup>[36]</sup>。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的落后性决定其总有早发性社会变迁存在,由于现代社会变迁中的规律普遍适合于各种社会区域,

所以 结合民族特色与自身实际 ,学习和借鉴已有社会变迁的一切优秀成果 ,以东部地区和汉族地区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进程积累的有用的经验为借鉴 积极引导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进程和方向 并尽可能吸取其现代化的教训 尽可能地少走弯路 少犯错误 降低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中贫富分化、环境恶化和变迁无序等成本代价。

### 【参考文献】

- [1]王希恩. 关于民族融合的再思考[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2010 ( 1) .
- [2]史蒂文·瓦戈. 社会变迁(第5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3]岳天明. 论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制约因素[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2 ( 6) .
- [4]郑杭生. 民族社会学概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5]赵利生 等. 中国民族社会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1 ( 1) .
- [6]罗伯特·F. 墨菲. 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7]陈庆德. 发展人类学引论[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 2001.
- [8]T. K. 彭尼曼. 人类学一百年[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8.
- [9]埃米尔·迪尔凯姆. 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 [10]陆学艺. 社会学[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6.
- [11]方季莉. 费孝通晚年思想录——文化的传统与创造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5.
- [12]王铭铭. 想像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13]费孝通译文集(上册) [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2.
- [14]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 [15]耶尔·塔米尔. 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16]马戎. 民族与社会发展[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1.
- [17]岳天明. 中国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18]威廉·A. 哈维兰. 文化人类学(第10版)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 [19]岳天明. 浅谈民族学中的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5 ( 2) .
- [20]彼得·伯格. 与社会学同游[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21]奈杰尔·拉波特, 乔安娜·奥弗林.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 [22]詹姆斯·皮科克. 人类学透镜(第2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23]露丝·本尼迪克. 文化模式[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1987.
- [24]安东尼·吉登斯. 民族—国家与暴力[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25]H. 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26]弗朗兹·博厄斯. 人类学与现代生活[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 [27]岳天明 魏冰. 现代化进程中调适我国民族关系的几个基本问题[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10 ( 3) .
- [28]拉德克利夫—布朗. 社会人类学方法[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 [29]妥进荣. 东乡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0.
- [30]岳天明. 传统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再审视及民族学意义反思[J]. 西北民族研究 2010 ( 1) .
- [31]王宗礼 ,等.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研究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8.
- [32]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33]马克林 岳天明. 甘、青特有民族法文化特色及法制建设的思考[J]. 甘肃社会科学 2004 ( 4) .
- [34]张琢, 马福云. 发展社会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35]赵利生. 民族社会学[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
- [36]贺卫光. 论多元文化中的民族变迁[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2011 ( 4) .

( 责任编辑 暴雅艳)